纸春秋 路也专栏

灭苍蝇运动

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

学校里掀起了灭苍蝇运动，为了鼓励大家积极打苍蝇，学校里要求每人每天都要打苍蝇，并且把亲手打死的苍蝇上交给自己班里的卫生委员，由卫生委员数数有多少个，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每周根据歼灭苍蝇的个数评出一、二、三等奖，颁发书包铅笔盒钢笔铅笔练习本等不同类型的奖品。

于是我和妹妹每天都举着一个苍蝇拍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随时随地准备打苍蝇，而且准备了火柴盒和小瓶子等容器来盛装它们的尸体，这些小容器就塞在书包里，每天跟文具一起背来背去的。后来我们打苍蝇成瘾，吃完午饭之后就在自己家里转来转去地找苍蝇打，连午觉也不肯睡了，两个人难免要发生苍蝇争夺战。家里的苍蝇打完了，我们很失望，恨自己家里太干净，嫌苍蝇不够多，就打开纱窗故意往屋子里引苍蝇。屋子里的苍蝇毕竟是有限的，我灵感一来，提议下楼去垃圾箱里找苍蝇打，于是我们悄悄地下楼，来到大太阳底下，钻到水泥砌的垃圾箱里去了。垃圾箱空间很小，在盛夏的高温里散发着腐烂的气味，我们钻进去，几乎趴在一堆烂西瓜皮上。我们收获很大，里面苍蝇成群，个头也大，我们如获至宝，接连把一个又一个苍蝇尸体收到我们的容器里去，感觉发了大财，仿佛我们收集的不是苍蝇，而是元宝，我们很有成就感，像是打了一场淮海战役。

卫生委员任务更是繁重，黄昏放学之前，要把每个同学带来的当小棺材用的容器亲手打开来，把死苍蝇倒在书桌上，用手指拨弄着，一个一个地仔细计数。如果数错了，在一旁监督的同学就大呼小叫，要求重数一遍，教室里很热闹，估计跟社员向人民公社交公粮的场面差不多。

后来我发现我和妹妹无论多么努力奋斗，每周结算苍蝇总数时，我们在自己班里总是无法名列前茅。通过我的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那些上交的苍蝇当然不能被做成木乃伊保存起来去流芳千古，各班卫生委员在统计完同学们交上来的这些苍蝇尸首之后，就把它们扔到教室后面的垃圾箱里去了，常常有一些学生跟在卫生委员身后等着。卫生委员前脚走了，他们后脚就跟着去捡死苍蝇了，捡了死苍蝇放到自己的小盒或小瓶里去，重新交回到卫生委员那里，数上一遍，登记下来，到周末结算时，就可以领到这样那样的奖品。原来有人如此作弊，我很生气，我主要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呢？我和妹妹自然不肯落人之后，于是也常常跑到教室后面去捡卫生委员扔下的苍蝇尸体了。于是打苍蝇变成了捡死苍蝇。

那年的灭苍蝇运动一直持续到天凉了秋风刮起来了，终于没有苍蝇可打了，才算结束。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衣锦夜还乡

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

在各大城市的论坛里，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的帖子，格式通常如下：

题目一般是“我要不要卖掉广州(或者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子，回到西安(或者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银川)”，内容一般是“我于199×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现在就职于某某公司，月收入××元，2002年在某某区以××万元购买住房一套，现在卖出可得×××万元，在我的家乡某某市可以购买若干平方米的住房(不会低于原来的住房面积)，尚余××万元，可以购买××平方米的铺面进行投资，我要不要卖掉房子回到某某市？”还有一种，是“我有×××万元，不想工作了，请大家帮助我推荐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

要了解中国十五年来的变化，可以把这类帖子当作入门普及读物，里面各种元素齐备，上世纪90年代的南下北上潮，以加速度扩大的沿海和内地的差距，2004年后的房价狂飙，全藏在冰山的尖顶下。但我们宁肯避重就轻，去探讨一下他们回去的可能性。首先是动机的由来和强度，对于习惯了寻找“万恶之源”的人来说，高房价、可怖的交通，可能都是他们回去的动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和上世纪90年代拥入大城市时不一样了，知道了自己要什么、能要到什么、以何种方式要到。而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一个不断否定和排除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在不断得到中完成，得到过才敢说放弃，在超级巨大城市生活过，才有逃离的资格。

他们也可能是“混不下去了”，但这个“混不下去”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就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行将由上海返回鞍山的姨妈，坦然地承认自己“混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她是被男女感情、被高度紧张的人和人的关系耗干了。如果在北京四环的某座立交桥上或者在地铁里度过生不如死的几个小时，正常人恐怕都会有“混不下去了”的感触，毕竟我们不是时刻以钢铁战士的姿态存活于世。即便是因为经济问题混不下去也不要紧，嫦娥一号也需度过没有月光的黑暗时光，混不下去才是人生常态。城市生活是一种能力，在超级大都市的生活，往往需要提高这种能力，换个这种能力需求度不那么强烈的地方生活，可能会容易些。

不过，回到家乡，面对的还是“要什么”的问题，有人细述了自己携款抵达以逍遥闲散著称的丽江后的生活，早上11点起床，吃过饭后，去打麻将，到了五六点钟去吃饭，吃过饭后换个地方打麻将，晚上11点左右去吃串串香，吃过以后继续打麻将一直到凌晨3点，然后依依惜别，而周末就是到周边的农家乐去打麻将。半年后，他逃离了“这种以中老年离退休职工休闲方式为主”的生活。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始终要面对的，只是生活，在哪里面对都一样，如果在家乡面对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不妨衣锦夜还乡。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烤鸭子与板鸭子

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

在我省潍坊市教育局长李希贵写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1991年，高密四中高一扩大规模，新扩出来的两个班没有语文老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学校只好让其他班的老师帮这两个班的学生一起拟定自修计划，让学生自己学习。但自学语文课本太枯燥了，老师就允许他们到学校阅览室读书，后来还允许他们把阅览室的书借出来，分到学生手上，轮流阅读。学校发现，学生们对没有语文老师的语文课的这种上法非常喜欢，过去，学生一直对语文教学有意见，现在倒好，没有语文老师，意见也没了。但是，学校从领导到老师，无不为这两个班的语文教学成绩捏着一把汗，怕末了对家长不好交代。等把语文老师调来时，一个学期也快这样对付过去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期末考试中，这没有语文老师的两个班，语文基础知识部分并不比平行的其他班差，而且阅读和作文的成绩还略胜一筹。这个结果令老师们感到无比尴尬。

李希贵反思：也许正是因为没了老师口若悬河的分析讲解，没有老师填鸭式的机械训练，学生们才得到了自主学习的空间。从那时起，李希贵开始了语文教改的探索。

1995年，李希贵做了一个实验，他让自己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大伟和正在上初四的侄女庆玲一起参加了当时的高三语文期末考试。两份试卷混同其他试卷一起评阅。考试结果让全体语文老师都非常尴尬：大伟的成绩是82分，庆玲的成绩是85分，而高三学生的平均成绩是84.5分。学历分别相差7年和3年，成绩却相差无几。对此李希贵说：“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语文能力从来都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自主阅读、感悟出来的。”

教育界近年流传一个“烤鸭子”的段子，说：首先，老师们都是“赶鸭子”的，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一个个把学生赶进教室；接着是“捆鸭子”，把学生牢牢地捆在座位上；然后是“灌鸭子”，把教师自己知道的东西统统灌给学生；接下来是“烤鸭子”，让惯用的“法宝”——考试，考得学生焦头烂额；最后，当学生出校门的时候，自然也就成了“板鸭子”。

李希贵说：“就像幼儿学走路，的确需要扶持，但绝不能一味地扶持，孩子真正学会走路和奔跑，都是在大人松开扶持的双手之后。”

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的一个故事：1895年夏天，16岁的爱因斯坦刚在德国一所中学完成学业，只身离开父母，来到瑞士苏黎世，报考联邦工业大学，却没被录取。联邦工大的校长推荐他到阿劳州立中学补习一年。后来，爱因斯坦把自己在阿劳州立中学的这一年视为他心理发展和成型的最重要的阶段。1955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述：“这个学校用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淳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同我在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一个德国中学的6年学习相比，我深切地感到，自我行为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优越啊！”

把学习比作呼吸，这比喻真好，不仅凸显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学习的本质。好的教育是自我行为和自我负责的教育。学习的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学习。有了想象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自主选择阅读内容的自由，学生的脑子里才会产生问题，才会带来求知的需求，才能由不自由不断地走向自由。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别学人家耍花腔

吴克成，教师、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别看人类已有了上天入地的本事，但有时候还得看天的眼色行事。比如要赶上多地干旱，搁从前官员百姓都要上阵求雨：先荤素搭配献上猪牛羊和时鲜水果，遇到好色的——比如西门豹辖区的河伯——还须挑漂亮姑娘去献身。然后众人还要跪倒尘埃苦苦哀求，从后面看，黑压压一片屁股。

也有不信邪跟老天公开叫板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北洋军阀时期任山东省长、直鲁联军总司令的莱州人张宗昌。别地的官员都协同百姓到龙王庙撅着屁股祷告，他径直到龙王庙打龙王的脸，还不讲究文明礼貌，边打边对龙王说脏话：“×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上车径去，留一地百姓和官员大眼瞪小眼。第二天，见龙王没有反应，张宗昌又命炮兵团于千佛山列十九尊大炮，朝天实弹捣龙王的老巢。龙王大概长这么大也没遭过这样的劫难，头天一顿暴打打得三魂跑了七魄，炮一轰，三魂七魄醒转来，找到了真身回过了神，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当时报纸称作“未之前闻求雨术”。

不过像张宗昌这样的人属稀缺资源，还是随大流的人多。《红楼梦》里的贾政是皇亲国戚，到了地方上，大河还得顺着小溪流。在《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中，一直在中央为官的贾政放了外任，开始时用的还是在京里的那一套：操持一方清水衙门，自己拒收额外的米，属下也跟着喝西北风。但正屋学的拳在这里施展不开，属下们打不到鹿，便合伙来敲贾政的闷棍，“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候，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直到贾政手下的李十儿说明原委，贾政随了大流，慢慢才“事事周到，件件随心”起来。

心理学里管这“随大流”叫做“从众”。所谓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与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从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寻求行为参照。在许多情境中，个体由于缺乏知识或者其他原因(如不熟悉情况)，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适合自己行为的信息。林黛玉进贾府吃第一顿饭时，依众姊妹的做法，将丫头递上的茶漱了口，倘若她不察言观色，仍像在自己家以为是喝的茶，一口咽下去，势必成为笑话。二是出于对偏离的恐惧——尤其是东方文化，一只鸟翅膀再硬也须依群而行，离群索居或者栖的枝比众鸟高，必须有两样宝贝护体，一是真金不怕唾沫星剑，一是明枪暗箭防护衣。

从众的花样品种也不少，这里说两种。一是真从众，人人都去隆“八戒式”鼻子，你觉着不错，也到“隆你没商量整形科”去隆个回来，就叫真从众。另一个是权宜从众，就是个体在行为上与群体保持一致，但内心却怀疑群体的判断，相信真理在自己这边。这是最普遍的从众方式。开会表决，别看手举得齐刷刷，心里到底想什么，真的很难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被浮云遮望眼，群众攻占巴士底狱送他上断头台的那天，他还以为天下太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无事。”

因此，别听到“咩咩”叫就以为是真羊，还须找机会掀掀羊皮看仔细，小心把狼引进家。另外，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还是本色一点更易有幸福感，是鹦鹉你就拖起花腔唱，假如是狗就没必要学着人家耍花腔。本来自己想嫁鸡，看到人家都嫁给了昼伏夜出的老鼠你也跟着嫁过去，一辈子都会挣扎在矛盾里。

编辑：孔昕
美编：晓迪